

社会语言学丛书

*Labov's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拉波夫的语言变化观

孙金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会语言学丛书

*Labov's
Theory of Language Change*

拉波夫的语言变化观

孙金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波夫的语言变化观/ 孙金华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1

(社会语言学丛书 / 徐大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571 - 3

I. 拉… II. 孙… III. 社会语言学—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55131 号

出 版 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press.nju.edu.cn>

出 版 人 左 健

丛 书 名 社会语言学丛书

书 名 拉波夫的语言变化观

著 者 孙金华

责任编辑 荣卫红 编辑热线 025 - 83592148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丹阳市兴华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4 字数 244 千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571 - 3

定 价 28.00 元

发行热线 025 - 83594756

电子邮箱 sales@press.nju.edu.cn(销售部)

nupress1@public1.ptt.js.cn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代序)

徐大明

提 要 近 20 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 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与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 2002 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 2003 年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关键词 中国社会语言学 文化语言学 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

一 反思和总结

社会语言学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传入我国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到 2003 年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成立之前,按照郭熙(2002)的说法,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历了“初创阶段”和“迅速发展阶段”,而进入到“稳定深入发展阶段”。除了郭熙(2002),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进行回顾和总结的文章,还有高一虹(1996)、陈章太(1998)、沈家煊(1999)、曹志耘(2002b)、祝畹瑾(2002)等,其中有很多共识,也各有独到的分析。高一虹(1996)比较详细地论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开始的高速发展阶段,分析对比了 1987 至 1992 年召开的三次全国社会语言学学术研讨会。陈章太(1998)以世纪为时间框架,追溯到罗常培等早期学者为中国社会语言学奠定的基础。沈家煊(1999)分析了近年来社会语言学中几个重要方面的发展情况,包括语言调查、出版情

况、理论探索、语言规划等。曹志耘(2002b)指出了本学科发展的青年化、实证化、实用化的有利趋势,同时指出了中国社会语言学面对着世界少有的丰富复杂的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对象及历史性的大变革大发展的社会条件的契机。祝畹瑾(2002)强调了对社会语言学基质的多元性、社会性、实证性的认识,指出要“在学习掌握别人已经积累的知识、经验、方法、理论的前提下”发展创新。

上述几位学者也指出,虽然我们在研究上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从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整体发展来看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的薄弱、方法的简单、内容的偏颇等方面的问题(陈章太,1998、2002;沈家煊,1999),以及“学科定位”偏差的问题(高一虹,1996)。由于“学科定位”一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关心的问题(高一虹,1996;苏金智,2004),所以,在此我们着重分析一下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偏差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需要结合“文化语言学”的问题来进行分析。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到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依笔者之见,“文化语言学中国潮”(邵敬敏,1995)是一次难能可贵的“走自己的路”的尝试;其对语言学学科的发展的长远影响,目前还难以估量;但就其对中国社会语言学近年来的影响来看,是可以做出一些总结了。文化语言学的基础,从传统的角度,既可以追溯到罗常培等学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对民族语言的研究(王福祥,1996;游汝杰,1995),又可以追溯到“通经致用”的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陈建民,1995;游汝杰,1995),还被联系到洪堡特、萨丕尔等西方学者的有关思想(陈建民,1995;戴昭铭,1996)。在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热潮的初步发展阶段,除了少量过度偏颇的内容之外,很多有用的研究是在人类文化学、社会语言学的思想观点的鼓舞之下的自发性的努力,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后文化语言学逐渐走向冷静持重,开始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努力,这时就开始考虑与社会语言学的区别和界限了(戴昭铭,1996;邢福义,2000;等)。

现在看来,比较理论化的文化语言学确实具有比社会语言学更加宏大的研究目标和更加宽泛的研究对象(刘丹青,1995;邢福义,2000;等)。相比之下,社会语言学更加集中到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在语言学中的应用,其解释的对象主要为语言现象,比较宏观的目标对象也不过是人类的言语交际活动及其社会效应,与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在研究范围上较少出现重合与竞争。从今后的发展看,那些与社会语言学观点方法基本一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自然

可以“一举两得”,而那些不受社会语言学理论方法限制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也可能对社会语言学的发展有所启发和促进。但是,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则应该更加明确自己的理论定位,不应再把以文化为目标的研究内容作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了。

之所以容易出现研究目标上的混淆是因为对社会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性质的模糊理解,以及对语言学“本体研究”的狭隘的解释。社会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就其目前发展的总的状况来看,并不是“包罗万象”的各种“非本体”研究,而是在有限的几套理论指导之下的对语言“本体”的一些分析和解释。社会语言学之所以取得目前的学科地位,主要是由于它在推动语言学界认识到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静态系统而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系统方面所起到的主要作用。将社会语言学作为一个不偏不倚的介乎语言与社会(或语言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学”来看待是过于理想化的推论。在每一项实际的研究中,都有或者侧重社会学目标、或者侧重语言学目标的内容。其“语言学目标”一般是对语言结构现象或语言使用的社会因素方面的解释,与语言学传统的研究目标(如解释语音、语法结构的系统性,语言的演变,语义的确定等)完全一致。语言的社会作用自然是社会学家关心的问题,但是对社会的解释如果要借助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则需要建立在对语言现象的社会性质的解释之上,是语言现象本身体现了某种社会意义,而不是仅仅由社会学指派给语言某些外在的社会功能。^①

在2003年之前,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已经开始了认真的反思和总结,认识到了学科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但是,对于“文化语言学”影响下的学科定位问题似乎还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上面提出的一点分析自然是在对比了近几年的新发展之后做出的,但希望仍然有助时局。

二 国际交流

除了学科定位的问题,几位学者还指出,在这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当中,

^① 游汝杰(2004: 16)指出,“狭义的社会语言学及其基本理念和研究方法是社会语言学的初衷,也是社会语言学的精髓所在”。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薄弱环节主要是与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交流不够,对于先进的理论和方法了解不够、消化不够,创新的起点没有建立在全面综合国内外现有成果的基础上,因此难以取得较大的进步(祝畹瑾,2002;高一虹,1996;等)。与国外同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比较,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一方面在文化语言学的带动下,拓宽了自己的研究目标;另一方面也忽略了一些国际社会语言学已经进入的研究领域,如对语言的社区特性的研究、对聋哑人群体及手语的研究、对于语言演变的实时研究、对于语言规划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语言与某些宏观社会现象的联系的研究(如语言与认同、语言与平等、语言与权势等),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同仁在对我国社会语言学成果进行反思和总结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了国际交流活动。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显现出与国际接轨的显著特点。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威廉·拉波夫2001年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系列讲座为此拉开了序幕。随后于2002年9月北京语言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主办了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互动社会语言学创始人约翰·甘柏兹应邀来北京作大会主题发言,之后又依次访问了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在新世纪开端的时候,社会语言学中两个主流学派的学派领袖,同属世界上第一代社会语言学家的学者,递次访问中国,传薪播火,因此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语言学的发展。与此相呼应,2002年前后,《中国语文》、《语言教学与研究》、《语文研究》、《民族语文》等杂志都增设或者扩充了“社会语言学”的栏目,数十篇社会语言学的论文得以发表。

2002年的首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始汇集了国内外一大批志同道合的研究人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以“中国社会语言学”为研究领域的国际性学术组织“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开始酝酿。“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随后也逐年召开,规模不断扩大,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国际交流的平台。^①

^① 2005年12月,在广州外语外贸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注册代表已达240余人次。

三 组织上的整合

2003 年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年,一系列重要的事件在这一年发生,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2003 年 2 月,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在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成立。从此,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有组织、有规模、有重点,以及方向性和目的性比较明确的发展阶段,也即,如江蓝生(2004)在中国社会语言学会成立大会发言中指出的“向纵深发展”的阶段。仍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新阶段也是对前面阶段的继承;这既是世纪之交的总结和反思引发的结果,也是新世纪迅速展开的国际交流活动促发的结果。

2003 年 6 月,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成立,这又是引进国际先进经验,进行教学和科研创新的一个结果。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于 20 世纪 80 年代首创于美国宾州大学,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一个创新,也是用科学实验方法论指导语言研究的一个尝试。宾大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以及随后的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目前成为世界上两个最成功的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它们不仅建成了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基地,而且建成了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社会语言学人才培养基地;这两个实验室培养的人才现在占据了許多国家的重要科研机构的领导位置。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就是按照宾大及渥大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模式建立的科研机构,除了继承其科研管理和教学活动的许多成功模式之外,南大实验室又有很多创新。南大实验室的特点是将科研与本科教学相结合,尽早吸引本科生进入社会语言学的调查研究工作,由教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多层次的研究梯队和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研究团队。在研究内容方面,南大实验室除了将语言变异研究体系以及社会双语的研究成果引进之外,还进一步发展了“言语社区”理论,开创了“城市语言调查”的新研究方向。南大实验室自成立以来,举办了两届“城市语言调查”专题报告会,承办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合办了两次全国性的讲习班,组织了多次语言调查活动,还进行了语言专业的社会服务活动;实验室成员并且承担了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在内的多个研究项目,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南京大学已经成为国内外瞩目的一个社会语言学研究的

重镇。

2003年10月,《中国社会语言学》学术期刊创刊。该刊物由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编辑出版,在创刊号中宣布了学会的宗旨:“组织开展关于海内外华人、中国各民族语言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从此,这个研究领域的成果有了一个通畅的发表途径。目前该杂志已经出版了5期,发表中英文论文总计一百余篇,受到国内外学者和学术机构的欢迎;所载论文多次受到国内外重要转摘刊物的转载和摘引。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发表论文的作者既包括像约翰·甘柏兹这样的世界一流学者,也包括在“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脱颖而出,获得“青年学者奖”的研究生。虽然发表的论文的研究范围大都集中在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几个热门话题,但是撰文作者的文化和学术背景却十分广泛,包括来自几大洲的语言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不同专业的学者。从不同理论视角、应用不同研究工具对共同关心的课题的探讨,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

2003年11月,澳门语言学会、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澳门理工学院联合主办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成立大会,澳门特区政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语言学会以及教育部有关部门的领导到会祝贺。一百多位国内外语言学家聚集澳门,就“社会语言学理论”、“语言生活”、“语言变异”、“语言交际、应用和教学”、“语言与文化”、“社会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专题进行了研讨。同时,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宣告成立。学会联合了国内外学者以及老、中、青三代社会语言学家,他们来自国内外的高校、民间和政府研究机构,有主要从事汉语研究和少数民族研究的国内学者,也有在国内外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和在国内进行外语教学的教师,还有语言学、人类学、教育学专业的学者。学会理事会通过了决议,十分具体地确定了近期的工作任务,即通过定期召开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和编辑出版《中国社会语言学》杂志,以及不定期地举办讲习班等活动,来促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这些工作目前都得到了全面的落实。

随后,从2004年开始,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还设立了“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通过严格的评选,奖励在研讨会上发表优秀论文的青年学者,鼓励和吸引青年学者从事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使中国社会语言学后继有人。目前,“中国社会语言学学会青年学者优秀论文奖”已经在第三届和第四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上颁奖两次。获奖人包括香港和内地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在美国就读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等9人次,产生了良

好的影响。

四 研究重点

2002年前后兴起了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新热潮,其特点是,逐步走向重视语言变异和文化的研究,重视理论的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言语社区研究”的新方向。2003年10月出版的《中国社会语言学》创刊号收入了16篇文章,可以分成“语言接触”、“语言变异”、“言语社区”等三方面的研究(徐大明,2003:151)。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语言学当时的主要研究范围和发展趋势。

近年来出现的另外一个良好趋势是许多方言学家转向社会语言学:许多方言学的研究增加了社会语言学的内容;或者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全面应用到了方言的研究上来。国际语言学界出现的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融合的趋势显然受到许多国内学者的欢迎,游汝杰(2004)指出,“社会语言学将是方言学发展的新阶段”。曹志耘(2002a)提出了在中国开展地理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将其定义为“以众多地点的语言事实调查为基础,利用语言地图的方式描述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状况,结合社会文化因素解释这些分布的原因,探索语言现象历时变化的过程”。曹志耘主持的“汉语方言地图集”课题将其主张付诸实践,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包括社会变异内容的方言调查。国际社会语言学界的一个新发展就是对方言区域分布的动态研究(Labov, 2005; Kerswill, 2003; Auer *et al.*, in press),而曹志耘的研究填补了国内该研究领域的空白。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包括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Fasold, 1990; Chambers, 1995;等)。对语言使用以及言语社区结构的研究,既属于社会语言学的核心理论的内容,又构成普通语言学的重要内容。社会交际和言语互动中的文化认同、语义系统以及语言意识形态的形成,直接产生信息交流、社会组织、群体意识、协作与冲突、生产和经济效应等方面的后果。这方面的研究,集理论与应用为一体,成为综合性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言语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两个课题的研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两个课题也是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中产生的新内容,下面给予进一步的介绍。

(一) 言语社区理论

言语社区理论对社会语言学迄今所取得的重要成果提供了一个集中性的理论概括,是社会语言学对普通语言学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目前提出的言语社区理论(Patrick, 2002; 徐大明, 2004),是在总结社会语言学几十年间积累的语言变异和言语交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几代语言学家对言语社区这一理论概念的论述而产生的研究成果。言语社区理论的核心观点为:语言作为一个具有一定同一性和稳定性的符号系统,既是人类言语交际活动的一种抽象,也是人类社会中群体结构的标记和区别特征;因此,语言的自然存现单位即是言语社区(陈松岑, 1999; 徐大明等, 1997; 徐大明, 2004)。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带来了对双语言社区、语言的社会分化、语言接触导致语言变化等方面的深入认识,旧的简单化的言语社区的理解和定义已经不适用了;但是,新的系统性的认识未能立即发展起来。目前,国际社会语言学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这方面研究的匮乏,并做出了一些努力,如帕特立克对言语社区概念的论述的历史性梳理(Patrick, 2002)、艾科特与麦康奈尔(Eckert and McConnell-Ginet, 1992)从社会学引入“实践社区”的概念等。但是,总的形势仍然是,言语社区的概念并没有得到澄清,其在普通语言学理论中的重要意义没有得到足够的认识;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发展出一个可验证的理论体系来。

在言语社区理论方面,中国社会语言学已经做出了一些贡献,并且将要做出更多的重要贡献。言语社区研究作为一个针对讲话人的组织系统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最广泛的研究对象,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不仅语言的资源取之不尽,而且汉语社区作为一个最庞大的本族讲话人的体系也是无与伦比的。言语社区是一个时空范畴,加上历史的深度,汉语社区就超过了在共时使用人数上与之竞争的英语社区。不仅在研究对象方面,而且在研究条件上,中国语言学界对言语社区的研究都具有优势。中国语言学界在汉语史方面、地域方言调查方面以及现代汉语语法方面的丰富的研究成果都可以成为针对中国社会以及国际华人社会的言语社区研究的基础。以社会语言学关于双语社会、语言接触、语言变异与变化、言语互动、语言认同等方面的理论为轴心,有可能将上述几方面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从解释中国的多层次、多形态的言语社区的具体目的出发,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一步一步将言语社区的理论发展完善

起来。

2004年12月,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首创“言语社区理论”的会议主题,公开征稿,匿名审稿,吸引了全球近200名学者投稿,作者既包括国际知名的一流学者,也包括立志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代表着十几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个院校及科研机构,参加会议的代表有126人,其中海外代表占三分之一强。大约四分之一的与会论文涉及“言语社区理论”的讨论,其作者大部分为国际学者;这些论文目前已陆续发表。这表明中国社会语言学界导引和推动的这一新的研究方向,已经得到国际性的回应。

(二) 城市语言调查

城市语言调查采用社会调查的方法,集中研究城市语言特征及城市语言交际中的问题,是社会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方向,是城市方言学与言语社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是适应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应用性社会语言学研究,也是将语言学研究引向针对现代社会的复杂多变的语言现实研究的重要途径。其理论意义为,从对语言使用的直接、实时的规模性观察中了解语言作为一个开放性动态系统的性质和运作机制。其社会现实意义为,提供城市语言状况信息,对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语言问题进行描写与分析,将其作为制定有关政策和解决实际问题时的科学依据。具体的研究课题可以包括城市方言与乡村方言、城市语言生活与乡村语言生活的类型性对比,城市言语社区的形成和发展机制,大、中、小城市语言形势及语言生活特征,城市化带来的公众语言交际的问题,城市非常住人口的语言状况及影响,城市语言调查方法论方面的研究,等等。

第三届城市语言调查学术研讨会充分体现了人们对城市语言调查研究的重视。该研讨会于2005年6月在南京大学举行。会议由南京大学、徐州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语言学会联合主办,由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承办。这次学术研讨会以“城市语言调查”为主题,成立了由7位国际知名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国内外公开征稿,匿名审稿。筹委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投递的论文摘要40篇,经评审29篇入选,到会宣读的论文有28篇。注册参加本次会议的代表42人,其中,来自8个不同国家的国外代表15人,占三分之一强。会议代表热烈讨论了有关城市语言调查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城市环境中的言

语交际问题,以及现代化、城市化进程所带来的语言认同问题。此外,许多实证性的调查报告,如北京、上海、深圳、香港、郑州、南京等地的语言使用情况的调查和语言变异的分析,英国、马来西亚、意大利等国家华人社会的语言状况的调查研究等,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本次会议的大部分论文已经发表在《中国社会语言学》2005年第2期,其余论文也基本列入了其他重要杂志的出版计划。目前几个不同单位都在准备今后主办“城市语言调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个系列学术研讨会将会迅速发展起来。

上述两项课题是中国社会语言学走向世界、走向先进的两个可能的突破点。其特点为,紧扣普通语言学语言本质的基本命题,吸收国际社会语言学最新成果,面对社会语言学的中心任务。与此同时,这两个课题又面向中国实际,针对社会问题,因而具有重要的社会应用价值。这两个方面的研究的新进展,是与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组织作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充分体现了专业学术团体在科研工作中的推动和导引作用。

五 学科振兴

通过反思和总结,2003年前后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同仁开始认识到学科发展的正确方向,遂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一方面引进国际先进经验,另一方面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进行创新发展。这期间具有标记性的有关活动是“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系列会议和“城市语言调查”系列会议,以及南京大学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教学和科研的创新实践。在这些活动中,中国社会语言学会起到了关键性的引导和支持作用。

中国社会语言学目前出现的有利形势在今后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双语及语言接触的社会语言学研究(包括濒危语言研究)将进一步繁荣发展,语言变异的研究将进一步加强,对进行中的语言变化的研究成果将不断展现。社会语言学的其他领域,如“会话分析”等对语言使用的不同流派的研究以及应用性社会语言学研究将进一步开展。国际性交流活动将进一步增多,国际领域的成果发表必然大增加。言语社区理论的研究,通过第三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促进,将会重点发展起来,有望成为国际范围的领先

成果。城市语言调查的研究,利用我国改革开放、经济转型和高速发展的社会条件,对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语言过程和效应的研究将有特殊贡献。同时必然产生许多有利于社会交际、人口管理、市场化经济等方面的实用性成果。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相互借鉴与融合必然进一步加强。农村方言的研究与城市语言调查成果的整合,将为层级言语社区模式的研究奠定基础。中华大言语社区的研究框架,将可能在进一步结合历史语言学和民族语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被提出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期待着中国社会语言学界的同仁共同努力,不断解决研究存在的问题,尽力消除研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创新的认识,来迎接中国社会语言学新的辉煌。

〔参考文献〕

- 曹志耘 2002a 《老枝新芽:中国地理语言学研究展望》,《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曹志耘 2002b 《中国社会语言学大有可为——在首届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陈松岑 1999 《语言变异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
- 陈章太 1998 《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语言学》,载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陈章太 2002 《中国社会语言学在发展中的问题》,《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戴庆厦 2004 《社会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
- 高一虹 1996 《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郭熙 2002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现状与前瞻》,《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江蓝生 2004 《第二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刘丹青 1995 《科学精神:中国文化语言学的紧迫课题》,载邵敬敏主编《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
- 沈家煊 1999 《近年来语言学研究综述》,载李铁映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苏金智 2004 《关于社会语言学的学科定位问题》,《语言·文字·应用》第1期。
- 王福祥 1996 《我国宏观语言学部分学科的发展概况》,载许嘉璐等主编《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邢福义 2000 《文化语言学》(修订本),湖北教育出版社。
- 徐大明 2003 《编辑后记》,《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徐大明 2004 《言语社区理论》,《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1997 《当代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游汝杰 1995 《中国文化语言学刍议》,载邵敬敏主编《文化语言学中国潮》,语文出版社。
- 游汝杰 2004 《汉语方言学与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中国社会语言学》编辑委员会 2003 《中国社会语言学》第1期。
- 祝晓瑾 2002 《关于培养社会语言学专业人才的几点思考》,《语言教学与研究》第1期。
- Auer, Peter, F. Hinskens and P. Kerswill. In press. *Dialect Change. The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of dialects in contemporary Europe*. Cambridge: CUP.
- Chambers, Jack. 1995. *Sociolinguistic Theory: Linguistic variation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Eckert, Penelope and Sally McConnell-Ginet. 1992. Think Practically and Look Locally: Language and Gender as Community-Based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1, 461—490.
- Fasold, Ralph. 1990.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Cambridge, MA: Basil Blackwell.
- Kerswill, Paul. 2003. "Dialect levelling and geographical diffusion in British English". In *Social Dialectology*, Britain, David and Jenny Cheshire (eds.), 223—243.
- Labov, William. 2005. *Atlas of North American English: Phonetics, Phonology and Sound Change*. Walter De Gruyter.
- Patrick, Peter L. 2002. The Speech Community, In J. K. Chambers, P. Trudgill, and N. Schilling-Estes (eds.), *The Handbook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573—598.

The New Trends in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Xu Daming)

Abstract In the 1990s, without good 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ly, many Chinese sociolinguists focused on "cultural linguistics". With the increased contact with the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s starting from 2001,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has entered the research fields of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and speech community investigation. Since 2002,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ICCSL) has been held annually, which creates the opportunity to present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to the worl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sso-

ciation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in 2001 signifies for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a new era characterized by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heor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cultural linguistics; ICCS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Sociolinguistics

(南京大学中文系, xudaming@263. net)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06 年第 2 期)

目 录

引 论	1
第一章 现代语言学理论中语言变化观的发展	6
第一节 传统的语言变化观	6
第二节 生成语言学的语言变化观	8
第三节 同质语言观的不足	11
第四节 社会语言学的语言变化观	13
第二章 拉波夫早期的调查研究	19
第一节 马萨葡萄园岛调查	19
第二节 纽约市调查	27
第三节 黑人英语土语研究	40
第三章 拉波夫的语言变化原理	51
第一节 著作的总体规划	53
第二节 内部因素	58
第三节 社会因素	70
第四章 拉波夫的理论贡献	98
第一节 言语社区中的语言变异研究	98
第二节 进行中的变化	103
第三节 变异研究成果的应用	110
第五章 社会语言学实验研究的发展	114
第一节 言语社区理论的发展	122
第二节 城市语言调查	126
第三节 社会语言学实验室的主要调查研究	130
第四节 语言变异与变化研究的新思路	134